



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

贺怀锴

摘要: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侵华日军孤注一掷地对中国豫湘桂要域发动大规模作战,蒋介石对此不仅估量不足,而且在豫中、长衡、桂柳战役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存在诸多失误,加之其他因素影响,致使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的局势。这一年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危险最大且忧患最深的一年,造成中国抗战史上堪称最为悲痛的一页。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指挥的失败,给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及军队沉痛一击,进而影响了1945年之后的中国政局走向。

关键词:蒋介石;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中国抗战史;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2.022

收稿日期:2020-07-18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2020CXTD02)、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2019CXT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怀锴,男,河南台前人,河南大学中国史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E-mail: hehuaikai1990@163.com。

中国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自1944年4月起至12月结束,历时8个多月,为日军侵华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战役的决策和因应是研究豫湘桂会战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然而,目前豫湘桂战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豫湘桂战役战史的宏观论述和考证,而关于蒋介石对该战役的决策与应对尚无专文讨论^①。因此,本文拟依托台北“国史馆”、日本亚洲资料中心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结合已出版的资料集、日记、报刊、回忆录等史料,对此问题作一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 评估的偏差:敌情研判与对日布防

1943年初,日本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的任务要求为确保现有占领地区,尚未考虑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作战。该年,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区接连失利。9月30日,日本紧急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将采取的战争指导纲要》,提出构筑“绝对国防圈”之作战目标,要求确保“千岛、小笠原、内南海(中西部)及西部”等要域“圈内海上交通”,并伺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②。此为“一号作战”的计划拟定与实施提供了战略支撑。11月25日,中美混合机群对台湾新竹进行了远程轰炸,日本大本营认为此举严重威胁到了“绝对国防圈”内的安全,要求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迅速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12月3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召开讨论会。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在当

^①关于豫湘桂战役的史实研究成果主要有:耿玉发《豫湘桂战役述略》,《历史教学》1989年第10期,第25—28页;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8—127页;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第25—28页;黄宗炎《1944年桂柳会战述评》,《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148—170页;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第109—127页;黄天华《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48—163页等。以上研究成果,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和借鉴。

^②『今後採るべき戦争指導の大綱 昭和18年9月30日』,1585—1586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4061064600。

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录：“如不采取对策，将给作战带来障碍。”^①会后，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进行紧急研究，并于12月7日向大本营上报作战指导大纲。1944年1月14日，从中国大陆起飞的美军轰炸机空袭台湾高雄。这促使日军加速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的进程。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上奏《一号作战计划》，随即得到天皇批准。同日，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南方军总司令官下达指令，要求遵照《一号作战纲要》，在3月中旬提出“作战计划”，并要求尽力做好作战意图的保密^②。这标志着日本“一号作战”进入战前准备阶段。按《纲要》的既定计划，一方面，日军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秘密实施备战事宜，于1月下旬开始“抢修黄河铁桥”，同时将平汉铁路“由小冀展伸至黄河北岸”，日机则自2月以来不断地对黄河南岸实施侦察，并自2月下旬开始日军“调动频繁，逐次向豫北输送”兵力，至4月中旬日军“复大量集中”于豫北^③；另一方面，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加紧制定作战具体实施计划，于3月10日完成了《一号作战计划》的编制，计划占领豫湘桂要域、破坏西南空军基地，并特别重视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图。这是日军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华大规模攻势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

在日军规划发起强大攻势之际，1944年1月，作为中国战区和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认为“倭寇本年必竭其全力固守太平洋现在战线”^④，尚未觉察到日军在中国会有大规模攻势。2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蒋介石计划发起对日全面反攻事宜，“我军对敌反攻作战的阶段即将开始”^⑤，表明他此时对日军发起“一号作战”的意图依然尚未察觉。直到该月下旬，日军在黄河北岸密集的调动才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蒋认为“敌寇对平汉路，似将有蠢动之准备”，“应研究对策”^⑥。但因蒋的研判仅基于日军对第一战区的小规模窜犯为前提，其研判的前提既已出错，之后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失误势必在所难免。

3月间，中日军队在郑州北部地区围绕黄河铁桥的修复进行了局部接触，日军在郑州北面霸王城附近加速抢修黄河铁桥的行动亦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3月4日，蒋介石认为日军“修黄河铁桥，其必企图打通平汉路”，“进攻平汉路之期不远矣”，“应速派空军不断轰炸”^⑦。3月7日，中方与美方陈纳德会商第一战区关于空军的部署与运用事宜，根据飞机侦察照片，中方认为郑州北部日军“有由郑州及信阳南北夹击平汉铁路之企图，现正赶修黄河铁桥，预计五月一日左右铁桥可以完成”^⑧，中美双方遂就派机轰炸黄河铁桥达成共识。蒋介石认为若空军对黄河铁桥不断实施骚扰轰炸，其修复日期必将推迟，故他预估“待黄河铁桥修成，则须在五月下旬”^⑨。3月12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将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向各军传达，“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进攻时间定于“4月下旬”^⑩。也就是说，蒋介石预估日军发动攻击的时间比日军计划攻击的时间约晚了一个月。日军“强修黄河铁桥，当经我一零师以猛烈炮火阻止”^⑪，为加速黄河铁桥的修复，日军华北方面军从关东军手中接管了部分桥架设备，继续推进铁桥修复作业。3月25日，日军对黄河铁道桥的修复工作“完成”，可通轻列车和中战车^⑫。蒋介石虽曾强调炸毁黄河铁桥和渡河装备，但由于“航委会未能派机前来，实施轰炸”，第一战区炮兵“未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页。

②大本营陸軍部『指巻9第1767号—1819号』，1838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4060930600。

③《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194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④《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305页。

⑥《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2月“反省录”。

⑦《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3月4日。

⑧《〈中原会战空军战史纪要〉附录第二其一〈中原会战主任周与美方协定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9页。

⑨《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3月8日。

⑩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丛稿译稿：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征求意见稿），第27页。

⑪《汤恩伯电蒋中正何应钦徐永昌邱山头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强修黄河铁桥遭一一〇师以猛烈炮火阻止并派精锐强行彻底破坏等情（1944年3月19日）》，第254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六十三），典藏号002-090200-00087-176。

⑫『京漢作戦。北支那方面軍（甲部隊）電報綴（2）自昭和16年至昭和19年（1）』，1242—1243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8000。

能彻底防止敌人修复”^①。黄河铁桥的提前修复,使日军发起攻击的时间由4月下旬提前到4月中旬。

为发动“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在日本又称为“京汉作战”或“コ号作战”),日军调集了第12军(第37、62、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以及第1、11军部分兵力,总兵力达14.8万人。其作战计划是:第一期由第12军首先强渡黄河天险,占领郑州、新郑一线,确保后续攻击;第二期由第12军对许昌、郾城等阵地实施攻击,为下阶段南下与西进做好准备;第三期由第12军主力从许昌、郾城附近向西迂回,伺机歼灭第一战区主力汤恩伯部,进而突入洛阳方面,同时以部分兵力自许昌南下信阳,与北上第11军共同打通平汉线。4月中旬,日军各部已在黄河北岸集结完毕。然而,国民政府军方面始终判定日军作战部队为几万人规模。在战前的3月下旬,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甚至对日军主力师团的“下落未判明”^②。

战前第一战区兵力为步兵38个师、骑兵3个师,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另调第八战区、第五战区部分兵力配合,总兵力约28万人。3月初,蒋介石向第一战区下达备战命令。该命令要求:首先,河、泛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犯及突围”;其次,如日军渡河突围成功,河防部队应凭借郑州、新郑等地“疲惫敌人”;再次,汤兵团及第四集团军“应以其控置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日军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③。蒋介石所定的防御计划,存在诸多不足:第一,蒋介石实际上放弃了在黄河南岸的抵抗,而拟于登封、密县、禹县等地与日军决战,“黄、汜本为天险,其障碍力之伟大,迥非一般地障所能及”,蒋介石却仅以少量“新成立”部队防御黄、汜,而计划在“郑州以南平地与敌决战,既不能歼敌于水际,又不能歼敌于我岸,造成敌空前之渡河纪录,黄河天险未能表现其功效”^④;第二,许昌城防兵力单薄,无法与汤兵团配合作战,失去了与日军决战的先决条件;第三,决战兵力分布于登封、襄城、郾城等地,兵力分散,重心偏南,易为日军逐个击破。

日军对国民政府兵力及防御计划了如指掌,并制定了针锋相对的作战方案;而蒋介石、军委会、第一战区司令部对日军发动战争的时间、兵力等方面的预判存在重大偏差,延误了第一战区的备战。自3月始,第一战区虽开始备战,但并不积极,对于“奉命固守之各据点均未能有充分之设备”^⑤。3月下旬,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甚至对日军是否发起会战“尚难判定”^⑥。战争前夕,第一战区“组织尚未就绪,人员亦未到齐”,兵力部署漏洞百出,分散各地。到4月中旬日军发动中原战役时,第一战区被“搞得措手不及”^⑦。

二 紊乱的攻防:蒋介石与豫中会战决策

按既定计划,日军在黄河以北分兵东西两路。4月17日夜,东路日军第37师团、独立第7旅团等部在中牟黄河北岸进入攻击位置,18日拂晓强渡黄河。由于国民政府在中牟一带守军(暂编第27师)单薄,日军于当日“未明”即夺取了黄河南岸地带^⑧,黄河天险未发挥应有的防御屏障效用。东路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兵力组成郑州挺进队,向郑州进军,主力则南下新郑。4月19日,西路日军第110、62师团等主力向郑州北部发起攻势,同时以27师团向汜水、虎牢关方向进行佯攻,伪装将由该地进攻洛阳。但是,日军战略意图却未能瞒天过海。如汤恩伯就

①《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6页。按:篇名日期中的“?”,系原书如此。下同。

②《汤恩伯电蒋中正豫鄂敌情及国军防务部署(1944年3月22日)》,第250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08450。

③《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61—62页。

④《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284—1285页。

⑤《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及善后处置意见(1944年)》,第203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内资料,典藏号008-010701-00039-018。

⑥《汤恩伯电蒋中正豫鄂敌情及国军防务部署(1944年3月22日)》,第250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084。

⑦刘子奇《中原战役概况》,全国政协中原抗战编写组编《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⑧『京漢作戰.北支那方面軍(甲部隊)電報綴(2)自昭和16年至昭和19年(1)』,1244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8000。

判断日军主力“会向郑州、许昌、荥阳、密、禹进犯”，其进攻汜水方面非主攻方向^①；蒋介石亦认为日军“欲打通平汉路，实无疑矣”^②。由于受许昌、登封一线决战方针影响，国民政府在郑州、新郑一线部防军队有限。4月20日，日军攻陷郑州。鉴于黄河正面中牟、郑州一线被日军突破，汤恩伯向蒋介石汇报，准备“以有利之钳形态势”，将日军“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③。4月21日，东路南下日军攻陷新郑。同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指出郑州、新郑等沦陷，“敌军在河南之行动狡诈极矣”^④。4月24日，西路日军攻陷密县。至此，日军完成了第一期作战目标，其主力逐步集结，准备南下许昌实施第二期作战。

4月28日，日军第12军主力自新郑南下许昌，蒋介石判定日军“打通平汉路之目的，已甚明显”^⑤，然后命令汤恩伯部“集结主力于登封、禹县、临汝间地区”，如日军继续西犯时，则“应立即向敌右侧背转移攻势”^⑥。4月30日晨，日军对许昌发起全面攻击，蒋介石“判断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向敌用全力决战，如许昌不为敌寇所占，则其企图乃可阻制”^⑦。汤恩伯随即向许昌守军新29师（师长吕公良）下达死守许昌的命令。蒋介石计划以新29师坚守许昌，“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而将汤兵团主力“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⑧。由于许昌守军兵力单薄，5月1日晨，许昌失守，师长吕公良战死，汤集团军向登封、禹县一带撤防集结。同日，武汉日军第11军北上策应日军华北方面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继续向南攻击，并于9日与北上日军第11军在确山“相合”，平汉线“全线打通”^⑨。至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日军此次作战意图之大。

日军认为国民政府军队的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整个战场的军队就会支离破碎。也就是说，歼灭了汤兵团，也就预示着打垮了第一战区的抵抗意图。因此，歼灭汤兵团成为日军第二期作战的中心任务。在发起攻击许昌前，日军就已侦知汤恩伯的主力在“登封一禹县附近”^⑩。为歼灭汤恩伯部，5月2日，日军第110、37、62师团与坦克第3师团等部自许昌向西转向，“急袭楔入”禹县方向^⑪。同日，蒋介石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以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⑫。然而，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日军坦克第3师团长驱直入，5月3日占郟县，4日占临汝，其中一部进抵洛阳南部龙门，日军坦克第3师团的急袭挺进“支配了战局”，使国民政府军“丧失了决战意志”^⑬。自日军转向西进，“敌人不出四、五日中，窜犯四、五百里，如入无人之境……即已达洛阳外围”^⑭。蒋介石致电洛阳守将刘茂恩等指出，“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要求刘必须督令其部“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⑮。同时，日军第110、62师团对登

①《汤恩伯电蒋中正刻与日军于中牟邙山激战及调整作战部署情形（1944年4月19日）》，第253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086。

②《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4月19日。

③《汤恩伯电蒋中正为适应二十日状况策定作战指导方案（1944年4月20日）》，第255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088。

④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349页。

⑤《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4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作战经过概要（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263页。

⑦《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4月30日。

⑧《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3页。

⑨『第二十三報/十四、大東亜各地』，130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B02130493300。

⑩『湯恩伯軍主力擊滅戰戰闘（行動）詳報 自昭和19年4月30日至昭和19年5月10日（1）』，475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3032139900。

⑪『京漢作戦.第12軍（仁部隊）電報綴（3） 自昭和19年5月6日至昭和19年6月8日（1）』，1412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8700。

⑫《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2日。

⑬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征求意见稿），第189页。

⑭《郭仲隗等要求严惩汤恩伯等提案及国民参政会议决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14页。

⑮《蒋中正电刘茂恩刘戡各军师长等身先士卒严律所部死守洛阳龙门阵地（1944年5月5日）》，第704—705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十六），典藏号002-090106-00016-524。

封发起攻势,并伺机捕捉击灭汤恩伯主力。鉴于登封后方被断,且已部军心涣散,汤恩伯下达突围命令,“力求避免被敌围歼,相机跳出敌军之包围圈”^①。5月6日,汤部放弃登封,向洛阳方向退守。5月7日,蒋鼎文致电蒋介石,告知“东龙门已为敌军突破”,蒋介石“闻之甚为骇异”^②。登封、龙门的失陷,预示着洛阳南部门户洞开。

登封、龙门失守后,守卫洛阳成为第一战区的中心任务。蒋鼎文以第15军军长武庭麟指挥第15军及第14军第94师担任洛阳守备任务。5月8日,蒋介石得知日军主力由登封、偃师向洛阳急行军,“乃即决定洛阳会战计划”,但蒋介石此时对豫中会战将帅前途“忽生悲惨之象”^③。蒋介石手令洛阳守军武庭麟,令其“固守洛阳十至十五天”,同时“督促外围大军增援洛阳”^④。为了策应第12军进攻洛阳,日军第1军第3旅团、第59旅团由垣曲南下,一举奇袭渡河成功,向洛阳西部澠池发起攻击。豫中会战伊始,国民政府军委会就已预测日军必会“以有力一部由垣曲指向澠池”^⑤,然而澠池守军却未积极布防,且稍作抵抗即撤出阵地,使得日军于5月11日夜轻易攻陷澠池,并向新安突进,造成洛阳城附近国民政府军西面退路被“遮断”^⑥;同时,日军第1军分出一部向西攻击陕县。5月13日,国民政府军方面因截获文件有潼关军团字样,蒋介石“乃觉敌军不仅要占洛阳,而且要攻西安,其事态严重极矣,乃即令宗南切实准备”,复于16日“令辞修(陈诚——引者注)中止赴豫,即驻西安部署陕西防务”^⑦。因陕县守军仓促备战,5月18日,西路日军攻陷陕县,阻断了第八战区的援军。同时,日军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部组成菊兵团,由汜水向偃师方向发起攻势,于5月11日占领偃师,从正东向洛阳逼近。蒋介石鉴于日军东、西、南三路围攻洛阳,乃决定“将全战区有力部队集结于伊阳、宜阳一带,待敌进攻洛阳时与之决战”^⑧。5月中旬,日军自许昌西进的坦克第3师团、第110师团等已攻至宜阳地区集结,第37、62师团向洛宁方向攻击,国民政府军由洛阳附近向宜阳、洛宁方向撤退。据日军情报观察,国民政府军撤退中“相当混乱”,因此,日军各部计划迅速解决洛阳“周边”^⑨。5月22日,洛阳城外围阵地尽为日军突破,25日洛阳沦陷。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军队退至豫西南山地进行防御和反击。

三 坚守与城破:蒋介石与长衡会战决策

豫中会战之际,国民政府方面尚认为日军不会对湖南发起进攻,军令部长徐永昌预计日军“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⑩。5月初,随着河南战局形势变化,蒋介石预测日军打通平汉路后会“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以打通南北交通,并认为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⑪。有鉴于此,蒋介石于5月14日电令薛岳“积极准备”^⑫。薛岳自恃以往长沙战功,坚信日军“不敢再问津长沙”,及至日军在湘北集结、大战迫在眉睫之时,他又一次采用所谓“天炉”战法,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吃过亏,此次必然会变更战术,“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但薛岳根本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默许薛岳的战术布置^⑬。国民政府方面先后调集了16个军、48个师,兵力约24万人,以第4军张德能守长沙,以第19军方先觉守衡阳,抽调部分兵力在新墙、汨罗、

① 王文政《汤恩伯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② 《蒋中正听取林蔚报告蒋鼎文来电称东龙门已为敌军突破敌之战车与敌军七八千已到关陵(1944年5月7日)》,第20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典藏号002-060100-00188-007。

③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8日。

④ 全国政协中原抗战编写组编《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29页。

⑤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至十一月第一战区军事概述(1944年5月)》,第1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民国三十三年第一战区军事概述,典藏号008-010701-00012-001。

⑥ 『京漢作戰.第1軍(乙集)電報綴(1)自昭和19年5月12日至昭和19年6月13日(2)』,1169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7400。

⑦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13、16日。

⑧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358页。

⑨ 『京漢作戰.第1軍(乙集)電報綴(1)自昭和19年5月12日至昭和19年6月13日(2)』,1168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7400。

⑩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93页。

⑪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361页。

⑫ 《蒋中正电薛岳日敌继平汉路后必向粤汉路进攻务希积极准备粉碎其打通南北交通线之企图(1944年5月14日)》,第708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十六),典藏号002-090106-00016-526。

⑬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7页。

捞刀等阵地节节抵制,以消耗日军正面力量,其主力则集结于两侧,“采取攻势以击破敌人,阻敌打破粤汉路”^①。然而,在日军看来,薛岳对此次日军攻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九战区所部“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②。

日军中国派遣军为发起长衡会战(又称“湖南会战”、“湖南战役”),共调集兵力约28万人,其中一线部队约25万人,以第11军为主力部队。5月2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抵汉口,亲自指挥长衡会战。鉴于薛岳依旧采用惯用的手段,畑俊六乃改变以往正面作战计划,将兵力分为二线,第一线5个师团,其中战力最强的第3、13师团部署于左翼,第68、116师团居中,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等部署于右翼,以图粉碎薛岳的侧击计划,并留出第58、34师团以及从河南战场调来的第27师团作为二线预留兵团。5月27日夜,日军第一线5个师团兵分三路发起全面攻势。5月28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湖南战役问题。会上诸将“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尤以白崇禧最为坚定,但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应在粤汉北路积极抵抗^③。徐的观点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认为,日军“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以兵力而论,彼自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④,决定在湖南与日军决战。6月2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各部,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⑤3日,蒋介石从情报部门得知日军“只有五个师团番号”,其指向“仅以株州、湘潭为止”,进而又推翻了前案,预估日军“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⑥。基于错误的情报,蒋又犯了轻敌的大忌,严重影响到湖南战役的布防计划。

6月7日,日军开始向长沙北部外围发起进攻,右翼第40师团于11日攻占益阳,16日攻占宁乡;左翼第3、13师团于14日攻下浏阳;左、右两路日军“图掩护其围攻长沙主力军之侧翼”^⑦。日军中央第34、58师团相继渡过新墙、汨水、捞刀河进逼长沙,日军制定以第34师团先取岳麓山、再以第58师团夺取长沙的作战计划。对于长沙防务,蒋介石一直强调“重点应在岳麓山,并配属相当炮兵”,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然而长沙守将张德能以第59、102师守长沙城,岳麓山仅以“第九十师任之,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三千人,担任防区竟达五十里之广”^⑧。6月16日,日军第34师团对岳麓山发起攻击,17日岳麓山部分阵地失守。为维持岳麓山局势与保全退路起见,张德能决定抽调主力前往岳麓山,但转移时被日军袭击,部队遂发生混乱。6月17日夜,日军对岳麓山开始实施重点“攻击”^⑨,岳麓山守将陈侃“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致使岳麓山于18日失陷^⑩。同日,第58师团对长沙城发起攻击,下午长沙被日军“完全攻略”^⑪,第4军“只抵抗一日而溃,其高级将领军师长皆擅自逃遁”^⑫,且将新式大炮等武器遗留于战场。为此,蒋介石大怒,“该军军长则非严惩不可”^⑬,随即将第4军军长张德能处死、第90师师长陈侃撤职。

① 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29日,第321页。

④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28日。

⑤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1944年5—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294页。

⑥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6月3日。

⑦ 《军令部拟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41页。

⑧ 《白崇禧蒋中正转报第四军长沙守城经过并请对张德能从轻议处(1944年7月12日)》,第281—282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09。

⑨ 『発来電綴(1号作战)支那各軍自昭和19年5月至昭和19年12月(2)』,96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406700。

⑩ 《薛岳电蒋中正拟请将陈侃林贤察陈伟光三师长撤职讯办及各记大过两次(1944年7月22日)》,第285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11。

⑪ 『発来電綴(1号作战)支那各軍自昭和19年5月至昭和19年12月(3)』,11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406800。

⑫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6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⑬ 《第四军擅自放弃长沙应惩戒其军长(1944年6月20日)》,第64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典藏号002-060100-00189-020。

日军攻占长沙后,决定趁国民党军立足未稳,采取乘胜追击的奇袭方案,命令中线第 68、116 师团迅速向衡阳挺进,同时令西线部队迅速向湘乡挺进,东线部队向醴陵、攸县挺进,以便为决战衡阳作外线支援。长沙失守后,蒋介石调整湖南作战方针,以保卫衡阳为最高目的,计划将第九战区主力配置在衡阳至长沙间两侧,以夹击深入日军,同时以衡阳第 10 军方先觉部“固守核心、吸引敌军包围、佐我外线反击”^①。当时,衡阳守军第 10 军下辖第 3、10、190 师及暂编第 54 师一部,约 1.7 万人。长沙沦陷当晚,蒋介石致电方先觉,告其“长沙已经弃守,日军继续南犯,有迅速打通粤汉路的企图,衡阳为西南军事重镇,必须确保”^②。6 月下旬,日军第 68、116 师团陆续抵达衡阳附近。6 月 28 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攻击。鉴于衡阳守军阵地坚固而已军攻击部队弹药缺乏,7 月 2 日,日军决定“中止”衡阳攻击^③。同日,蒋介石致电方先觉,要求其“务应沉着坚守,以待全部援军到齐,必待有利机会增援,以求得决定性之胜利”^④。为了鼓舞衡阳守军的信念,蒋介石派军机投送“固守待援”的手谕^⑤。7 月 17 日,日军后方补给陆续抵达衡阳后,对衡阳再次发起攻击,但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日军遂于 20 日决定再次停止攻击。鉴于日军两次攻击衡阳均失利的情况,蒋介石以为“敌军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复有增加”,“实已成为强弩之末”^⑥,要求衡阳守军配合夹击日军。然而,此时衡阳守军已基本呈现瓦解态势。衡阳守军原本共计 16275 名,经过日军两次攻击,到 24 日已“阵亡者共七八九八名,负伤五五六四名,现在实有战斗官兵二千余员名”,“阵地现有守兵均为全部杂兵编成者”,且炮弹等已尽,“虽空运一部,但为数寥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衡阳第四军已自顾不暇,“决无夹击该敌之力量”^⑦。薛岳亦认为,此时衡阳守军“困斗已久,伤亡甚重,疲惫匮乏,不忍言状”^⑧,经受不起日军的再度强攻。

当蒋介石判定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之际,日军正增调兵力,准备发起第三次攻击。7 月 29 日,日军抽调第 58 师团参加衡阳战斗,同时西线第 40 师团急进衡阳西部,抵御西部援军。8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援衡第 62 军挺进衡阳近郊西站,此为最接近衡阳城之国军援助部队。为鼓舞各军挺进衡阳,蒋介石传令嘉奖,但援军被日军阻援部队截断。8 月 4 日晨,日军攻城准备完成,下午 17 时对衡阳全面“攻击开始”^⑨。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前以为寇军攻衡已成强弩之末者,实错料也”^⑩。8 月 7 日,日军突入城内,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蒋回电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⑪,然而援军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8 月 8 日,方先觉率部“投降”,衡阳失守^⑫。衡阳失守,对国民政府方面打击甚大,使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中枢和第九战区陷入“焦虑”状态^⑬。蒋介石认为,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竟被敌所俘而屈”,“殊所不料”^⑭。衡阳失守后,国民政府向零陵、全县撤退,重点防御广西。衡阳

①《军令部拟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1944 年 8 月 26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 143 页。

②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第 229 页。

③『発来電綴(1 号作戦)支那各軍自昭和 19 年 5 月至昭和 19 年 12 月(5)』,228 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2122407000。

④《蒋中正电方先觉务加强城防坚守衡阳消耗敌兵力以待援军集中并约定代号是时必抵外围策应一举歼敌(1944 年 7 月 2 日)》,第 684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十六),典藏号 002-090106-00016-509。

⑤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 5 卷下册,第 2400 页。

⑥《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 年 7 月 20、24 日。

⑦《方先觉电蒋中正第十军自衡阳作战以来阵亡者众现在实有战斗官兵仅二千余人若不彻底击溃衡阳近郊之敌本军绝无夹击该敌之力量(1944 年 7 月 24 日)》,第 548—549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六十三),典藏号 002-090200-00087-305。

⑧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第 97 页。

⑨『発来電綴(1 号作戦)支那各軍自昭和 19 年 5 月至昭和 19 年 12 月(9)』,445 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2122407400。

⑩《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 年 8 月 5 日“上星期反省录”。

⑪《蒋中正条谕方先觉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1944 年 8 月 7 日)》,第 293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 002-020300-00014-116。

⑫『戦闘前ニ於ケル彼我形勢ノ概要』,21 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3071160900。

⑬『支情速報第 163 号 昭和 19 年 8 月 30 日 衡陽喪失に伴う重慶側の動揺状況に就て』,506 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3031924700。

⑭《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 年 8 月 9 日。

守军坚守 47 天之久，“由于较长时间拖住了敌人”，为后方军力的调动和部署“赢得了时间”^①。然而，第四战区却浪费了这一宝贵时间，并未在广西进行积极、充分的备战。

四 绝地求生到心之略慰：蒋介石与桂柳会战决策

蒋介石早在长衡会战之际，就预判日军此次作战“不仅打通粤汉路，而且同时进攻我抗战根据地之重庆与昆明空军基地，情势紧急万分”^②。在日军发起攻击衡阳之际，蒋介石认为“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阻止其企图，则“此次作战尚不失为成功”^③。为了防止日军沿湘桂路西进，蒋介石先后调集第 16 集团军夏威（桂系，防御桂林）、第 35 集团军邓龙光（张发奎部，防御桂平一带）、第 27 集团军杨森（川军，防御柳州）与汤恩伯（嫡系，防御黔南）等部，“兵力共十六个军，四十个师，约十六万人”^④，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负责，同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亦赶赴广西指挥作战。蒋介石主张坚守全州、桂林，以嫡系第 93 军（军长陈牧农）坚守全州，守卫广西门户。8 月 26 日，蒋介石对陈牧农下达“以主力固守全州”的命令，嘱咐其“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状闭锁式子母堡垒群，以增强阵地韧性”，积蓄“可供 2 个月用之粮弹”，并寄希望其“固守 3 个月以上”^⑤。次日，陈牧农向蒋介石汇报全州守备情况，称防御工事“已于二十六日开始构筑”，“拟以新八师全部固守主阵地及核心，以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该师主力将控置于全州车站以西地区为预备队”，同时粮弹集积“已开始准备中”^⑥。张发奎在巡视全州时就指出，全州地势不利于防卫，“守全州必守黄沙河”，而陈牧农于黄沙河仅部署一团兵力，并向张发奎“出示蒋的电令为据”，张发奎不敢违蒋之意，即按蒋电办理，然而“委座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地形”^⑦，铸成全州失守的危局。白崇禧以桂系老将第 16 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兼任桂林城防司令，统率第 31、46 军约 3 万部队坚守桂林。当时有人认为，“韦本人精力衰弱，难任艰巨”，并致电蒋介石更换守城主将^⑧，但白崇禧认为韦云淞为桂系唯一能守的将领，蒋遂默许之。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桂林阵地，应努力加强工事，储积足供三个月用之粮弹，以备能独立固守。”^⑨白崇禧则自诩：“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可以守上半年。”^⑩

长衡会战期间，日军第 11 军司令部本计划于 8 月中旬向“全州附近”发动攻击^⑪。由于衡阳城久攻未破，致使日军攻击全州时间向后推移。日军占领衡阳后，便有计划地部署桂柳作战计划。为统一入桂作战指挥，8 月 26 日，日军成立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司令部设于衡阳，下辖第 11 军（第 3、13、34、37、40、58 师团）、第 23 军（第 22、104 师团与第 22、23 独立混成旅团）、第 34 军以及第 27、64、68 师团等。9 月初，日军第 11 军主力向零陵方向发起攻击，5 日攻陷祁阳，日军第 11 军司令部察觉国民政府军衡阳以西部队向西南方溃走，并令各部向零陵追击。由于国民政府军零陵守军“未及周密部署”^⑫，日军于 9 月 7 日攻陷零陵。9 月 12 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

①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第 162 页。

②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 5 卷下册，第 2367—2368 页。

③ 《蒋中正主持军事会（1944 年 7 月 1 日）》，第 1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典藏号 002-060100-00190-001。

④ 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 215 页。

⑤ 《蒋介石致陈牧农密电》，黄铮主编《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 3 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5 页。

⑥ 《陈牧农电蒋中正全州附近工事构筑计划与兵力部署情形（1944 年 8 月 27 日）》，第 300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 002-020300-00014-120。

⑦ 李汉冲《一九四四年“桂柳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 年版，第 66—67 页。

⑧ 《桂林成立防守司令部等（1944 年 7 月 20 日）》，第 271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抗命祸国/抗战时期（六），典藏号 002-090300-00207-189。

⑨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44 年 8 月 2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 1342 页。

⑩ 李汉冲《一九四四年“桂柳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第 64 页。

⑪ 『「重慶」方面に対する作戦指導の腹案 昭和 19 年 7 月 7 日』，1360 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 C13032323700。

⑫ 《张发奎电蒋中正据零陵防守司令彭璧生称部署未及即遭攻击现突围转进（1944 年 9 月 12 日）》，第 473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六十一），典藏号 002-090200-00085-376。

全州守军可“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①。9月14日,日军突入全州,陈牧农稍作抵抗即“退却”^②,第93军“移界首以西”构建阵地,“阻敌西进”^③。全州失守,广西门户大开,日军主力陆续集结全州、道县一线,为入桂战斗作准备。蒋预测日军“进窥桂林之势,恐难挽救”^④,并致电桂林守军,要求各部“不顾任何牺牲”守卫桂林^⑤。

为了策应第11军进攻广西,在广东的日军第23军于9月10日开始西进,16日攻陷肇庆,22日占梧州,自此形成南北夹击广西之势。日军第六方面军下达总攻桂柳作战命令,计划第11军和第23军所部大致于11月初发起攻势,由第11军负责桂林作战,第11军与第23军联合进攻柳州。为与第11军共同发起对柳州的总攻,日军第23军自梧州继续西进,其中第23独立旅团于10月12日攻陷桂平,严重威胁柳州右侧防线。为了粉碎日军两路夹击桂林的局势,白崇禧、张发奎决定“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进犯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战”,桂林方面“极力拒止敌之进犯”^⑥。白崇禧、张发奎令张弛、黎行恕两军于西江方面先求击破桂平之敌,排除后顾之忧。10月21日,两军发起反攻桂平作战。此举出乎日军第23军的预料,第23军决定暂缓挺进柳州,先稳定桂平局势。因日军渐次集中兵力,又因国民政府军弹药接济不足,未能达到反攻目的。10月29日,张弛、黎行恕两军开始向柳州转移。同期,日军北线第11军亦进抵桂林附近,日军两线已做好总攻准备。

柳州守备有杨森部三个军,实际兵力不足2万人,且系长衡战役败军之余。杨森以第26军丁治磐部为柳州城守军。11月初,日军第11军军部鉴于柳州“守备薄弱”,乃派出第3、13师团与第23军“相呼应”,向柳州发起攻击^⑦,同时以第40、58师团攻占桂林。11月3日,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柳州守备部队调动频繁,自始即未确定一切准备”,部队“仓卒调集,尤无把握”,除非“能以空运二、三军到柳,似仍可撑持危局”^⑧。蒋介石认为“以固守桂林为主,柳州势难保守,故不愿再加兵力增防”^⑨。11月9日,日军向桂、柳城区发起全面攻击,10日柳州失守,11日桂林失守。桂林的有利条件是“多山地形,坚固的城墙与防御工事,它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⑩,蒋介石因此大发雷霆,“以集中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尽其所有,以供桂林之防务,乃战斗未至数小时,连其围城接战,亦不过二日,而即被敌寇极少数部队(不足一师团)完全占领,实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败绩”^⑪。11月18日,第22师团继续向南攻击,24日进占南宁,同时日军法属印度支那第21师团向北推进,于12月10日在绥禄会合,自此打通了中国大陆通道。

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后,国民政府军的主要航空基地“覆灭”^⑫。日军既定主要任务为打通交通线,对于是否深入黔省追击尚无定论。冈村宁次鉴于国民政府军主力向西部溃败,指出“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⑬,第3、13师团随即奉命向河池、南丹地区突击。为巩固贵州,11月11日,张发奎将第16、27、36集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部防于宜山一带,以实力尚存的第46军部署于宜山正面抵制日军。同时,为保卫陪都重庆,军委会组建黔桂边区总司

①《蒋介石着第九十三军一部留守全州主力转移桂柳方面密电稿(1944年9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31页。

②『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2)自昭和19年8月18日至昭和19年12月10日(2)』,470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4800。

③《张发奎电蒋中正(1944年9月19日)》,第475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六十一),典藏号002-090200-00085-378。

④《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9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蒋中正电张发奎此次桂林会战实为我抗战最后胜利关键所在我各级长官务必奋力发扬我革命军牺牲救国之精神以达成捍卫国土之使命(1944年9月16日)》,第311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二),典藏号002-090106-00002-148。

⑥《桂柳会战第四战区作战计划(1944年10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337页。

⑦『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2)昭和19年8月18日至昭和19年12月10日(3)』,51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4900。

⑧《张发奎电蒋中正桂林敌我情势如能空运二或三军到柳仍可撑持危局(1944年11月3日)》,第311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31。

⑨《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1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⑩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⑪《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1月12日。

⑫『戦闘後ニ於ケル彼我形勢ノ概要』,211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3071161600。

⑬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抽调7个军赶往黔南布防。11月13日,蒋介石认为,“如果敌寇不深入黔境,则战局渐定,犹能照预定战略实施,则西南根据地,仍不致动摇”^①。11月15日,国民政府军宜山第46军“自相惊扰,避开正面”,不战而逃,日军轻易占领宜山,击溃了国民政府军桂北防线。11月17日,张发奎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极有可能会继续“扩张战果”,“逼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②。正当蒋介石与张发奎推测日军下一步动向时,日军已决定突破省界,向贵州发起攻势。

11月21日,日本第11军军部向第3、13师团下达突破贵州省界线的命令。11月28日,日军占领桂北南丹,并向独山方向“突进”^③。蒋介石指责“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并调中央军前往阻截,催促何应钦前往贵阳负责贵州省军事防御指挥事宜,以黔桂湘边区司令汤恩伯负责前线军务,并解除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权^④。12月2日,日军第13师团占领独山。独山失守,震惊了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日军如继续深入,“则决放弃贵阳,固守乌江,以待各路部队之集中,再图反攻”,甚至不得已“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⑤,甚至一度打算将远征军调回。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主阵地设于乌江北岸,以贵阳为“前进阵地”,黔省“拟使用部队二十万人守备”,其中以黔桂湘边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前线总指挥,兵力约10万^⑥。汤恩伯以10万大军对阵日军2个师团而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由于日军追击兵力有限且军需供给困难,12月3日,日军第3、13师团收到第11军军部回撤命令。12月4日,国民政府军向八寨、独山发起反攻,8日夺回独山。蒋介石得知“克复独山县之报,此心为之略慰”^⑦。12月12日,国民政府军克复南丹,日军被驱赶出贵州省。自此,日军贯穿中国大陆的“一号作战”基本宣告落幕。

五 关于豫湘桂战役中蒋介石的表现与得失的评价

豫中会战后,陈诚认为,其失败“实在意料中,而中央尤须负责也”^⑧。这里的中央,即指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至于长衡、桂柳会战,蒋介石亦要负战败之责。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首先,蒋介石不仅是豫湘桂战役的战略部署者和战术的指导者,而且他还有直接指挥前线作战的习惯,故他要负战败之主要责任。蒋介石对于作战指挥,事无巨细,时常“越级亲自指挥”,“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国民政府军一线作战将领如违背蒋介石的意旨,无论胜败都将受其斥责,若遵蒋令,“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将领一般“没有责任”^⑨。因此,国民政府军一线将领形成一种惯例,无论蒋令是否符合战况,都遵令执行。此次豫湘桂战役亦是如此。蒋介石身在西南大后方,对前线战局的估量存在误差,他亦承认“军事部署以口头命令”,以致豫中会战局势溃败,“内心惭愧,几乎寝食不安”,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以后对前方战事,应专责军令部处理,而勿再直接干涉,更勿可用电话作口头命令”^⑩。蒋介石为什么频繁越级指挥呢?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可寻找到答案,根源在于蒋介石总认为“将领无能,自作战方针至局部处置,皆非亲自留心与处置不可”,在豫中会战中,他“几乎身任蒋鼎文之参谋官矣”^⑪。

其次,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的战术指导存在诸多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战术不知变更。长衡会战中,薛岳依旧采取以往长沙会战时所用的天炉战术,蒋介石亦默许之。而日军则变换战术,采取广阔正面进攻的战术,“在两翼经常保持强大的部队,致使我外侧作战难以成功。这都是由于敌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

①《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1月13日。

②《张发奎电蒋中正桂柳会战失利情形并恳速定大计(1944年11月17日)》,第312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 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32。

③『第11軍 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2) 自昭和19年8月18日至昭和19年12月10日(3)』,549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4900。

④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483页。

⑤《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2月2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宋思一《黔南事变前后》,全国政协粤桂黔滇抗战编写组编《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⑦《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2月8日。

⑧《陈诚函谭祥此次豫西战争之失败在意料中而中央尤须负责(1944年5月15日)》,第2—3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陈诚家书(十三),典藏号008-010201-00013-001。

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

⑩《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⑪《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入手段取得的成效”^①。其二,蒋介石坚持处处防守之观念,防御颇欠积极。在阵地防御战中,蒋介石“习惯于为坚守某地规定一个时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当地的真实情况”^②。桂柳会战期间,蒋介石认为全州可坚守三个月以上,实际仅坚持一天。豫湘桂战役中,“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如中原会战之许昌,长衡会战之长沙、浏阳、衡阳,桂柳会战中之桂林、柳州等,概以绝对优势兵力“施行攻击”,而蒋介石总是“逐次以不充分之兵力投入战场,且常步调不齐”^③,被日军分别击破。国民党军应变不足,一处为日军突破,致使整个战局趋于崩溃。日军“突破我一处后,即锐意扩张战果,大胆深入,适捕捉我军侧背感觉锐敏之缺憾”^④;而国民党军预备兵力不足,“致被敌突破后无力逆袭”^⑤,致使整个战局趋于崩溃。其三,蒋介石对日军发动攻击的时机和战斗力预估存在误差,致使战区备战仓促。在时间估算方面,豫中会战前,蒋介石预测日军发起战斗的时间在5月下旬,比日军实际发动战争的时间竟晚了一个多月。再如桂柳作战,“敌攻陷衡阳未及匝月,即进犯桂、柳,可谓合兵贵神速之原则……致我准备不克周到”^⑥。在敌方战斗力预估方面,衡阳战役期间,蒋介石竟然以为日军已到强弩之末,实际日军正运输兵力,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其四,国民政府军情报不准而导致蒋介石和军委会的战术指导屡屡失误。在豫中会战中,蒋介石和军委会判定日军兵力为几万人的窜犯,实际上日军兵力达十数万。在长衡会战中,蒋介石认为会战的失败“仍由于指导失机所致,而尤以虚伪之情报贻误处置非浅”^⑦。总之,蒋介石在战役的战术指导方面存在诸多失误,是导致豫湘桂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再次,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队最高统帅,治军无方,致使参与豫湘桂战役的国民政府军一线将领及部队存在诸多管理和建设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军的战斗力。在一线将领的管理与使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其一,蒋介石善用制衡办法驾驭部将,故每场战役中均存在战区部将不和的问题。豫中会战中,“蒋长官遇事多延诿,而汤副长官则事则越俎”,蒋鼎文、汤恩伯两人不能合作对敌,分别被日军各个击破^⑧。长衡会战中,衡阳守军方先觉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不和,严重影响了驰援衡阳部队的救援进度,致使衡阳城最终失守。桂柳会战中,张发奎认为,蒋介石“要白崇禧去广西协助我,那就意味着我被剥夺了权力”^⑨。豫湘桂战役中存在的双重指挥权,严重影响了作战的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多以此种办法制衡双方,进而居中斡旋,以驾驭战区部将。其二,蒋介石用人不明,遂导致部将指挥无能,统领无方。部分军队主官一味营商应酬,而忽视了军队建设。蒋介石就曾对汤恩伯严厉责骂:“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⑩,以致应战不力。其部分部将对战争缺乏必胜信念和旺盛精神,以致“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无法遂行战斗”^⑪,各防守阵地“毫未发生战略价值”,而守城将领“纷纷弃守”^⑫。其三,蒋介石对部将亲疏有别。豫中会战后,汤恩伯向蒋介石检讨:“职德薄能鲜,处置未善,要为主因”^⑬。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国民党部CC系提出严惩汤恩伯,然而“蒋介石则极力庇护汤恩伯”^⑭,甚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35页。

②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69页。

③《军令部拟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49、152页。

④《军令部编桂柳会战经过概要稿(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25页。

⑤《白崇禧电蒋中正转报薛岳报告长沙战役经过及失败原因(1944年7月6日)》,第280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08。

⑥《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1944年2月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369页。

⑦《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8月10日。

⑧《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及善后处置意见(1944年)》,第202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内资料,典藏号008-010701-00039-018。

⑨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86页。

⑩《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4日。

⑪《军令部编桂柳会战经过概要稿(1945年2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26页。

⑫《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及善后处置意见(1944年)》,第203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内资料,典藏号008-010701-00039-018。

⑬《汤恩伯呈蒋中正自我检讨中原会战失利并努力整补部队(1944年6月6日)》,第96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陆军人事报告及建议(四),典藏号002-080102-00075-011。

⑭《评此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4年9月24日,第1版。

至于11月中旬委任其为黔桂湘边区司令。蒋对非嫡系极不信任,正如蒋所自述,守洛部队“对余无直接关系,故信仰不笃”;桂柳失守后,蒋介石责骂桂系“避战远撤,不听命令”^①。在军队管理和装备方面,国民政府军普遍存在兵额不足、士气低落及装备陈旧等问题。其一,就数量言,国民党军队“兵力较敌为优”,而在质量上则“不若敌精练,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②。国民政府军几乎全为步兵装备,重兵器甚少,除了部分军队“有战车防御炮装备外,余均无”;日军装甲部队“行动飘忽,势如疾风,以致战局全盘失利,不胜痛心”^③。在中原会战中,就因日军坦克第3师急趋洛阳,使得登封的国军主力后方被截断而形成溃败之局。其二,国民政府军士气低落,毫无战斗精神。长沙守城第四军只抵抗一日而溃,其高级将领皆擅自逃遁。桂柳会战失利的主因是“士气低落,不同层级军官的战斗意志都动摇了”^④。桂柳会战期间,“每军兵员均仅及四分之一”,“尤其士气不振,一般缺乏信心”,“虽厘定缜密计划,而实施者每难应弦符节”^⑤。其三,国民党军队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以致民众到处截击部队而造成国军严重的非战斗损失。由于国民政府军“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致使“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⑥。

总之,由于蒋的战略战术指导失误,国民党军队部将指挥无能、士气低落,致使豫湘桂战役终究“未能达成持久防御任务”^⑦,进而导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一场战役大溃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蒋介石在豫湘桂战役中的表现和得失,应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蒋介石虽在治军和战略战术指导方面存在诸多失误,但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未动摇,即便是已然到了日军突破黔省边界的危难时刻,他“对于战局前途,则仍乐观”^⑧。纵观豫湘桂战役,蒋介石始终是主张抗击日军的。

无可否认,豫湘桂战役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的一次大溃败,国民政府因此丧失了豫、湘、桂、粤等省之一部或大部,失去了146座城市、30多个飞机场,损失国军兵力达60万人。这场战役在军事上给予国民政府军队以重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乃抗战以来“未有如此之逆境”^⑨。豫湘桂战役虽以失败结束,但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局而言,并非没有发挥任何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在此次作战中,日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摧毁了中国西南空军机场,但日军“消耗也决非轻微”。同时,这场战役还牵制了日本陆军绝大部分兵力,且持续长达8个多月,加上日军战略用兵“过于偏西”,使得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处于极不利的态势”^⑩。日本当局错误地以为能够以中国大陆战场的积极作战来弥补太平洋战场的颓势,但事实上豫湘桂战役对日军并没有产生突出的价值,反而致使日军战线再度拉长,兵力严重分散且不足,陷入疲于应付的局面,战略态势日趋不利。也就是说,日军发起“一号作战”,不仅未能挽救日军趋于崩溃的局势,反而加速了日军的败亡。因此,我们应秉承辩证、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豫湘桂战役的得失及其对时局的影响,不可片面地认为豫湘桂会战仅是中国国民政府军的大溃败,应该看到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和正面的意义。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威望产生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豫湘桂“这种悲剧式的溃败,不能

①《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25日、11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213页。

③《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194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93页。

④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86页。

⑤《张发奎电蒋中正桂林敌我情势如能空运二或三军到柳仍可撑持危局(1944年11月3日)》,第311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31。

⑥《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1944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290页。

⑦《白崇禧函蒋中正桂柳守军未能达成持久防御任务固因部队残破者多然何能辞训练未精之罪感愧未加谴责(1944年11月14日)》,第87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党国先进书翰(二),典藏号002-080200-00620-009。

⑧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484页。

⑨《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6月1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⑩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5页。

不引起全国人民之严重的愤懑”^①。当时中国民众对国民政府越发失去了信心,“不信政府之战报”^②。不仅国内民众对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之心,西南地方军人也对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如出现了西南粤桂军人发起、川康滇军人参与、民盟和西南联大教授积极介入的“西南联防政府”之筹组活动^③等,甚至国民党内部亦发生了动摇,部分党员“不加深察,起而附和”,动摇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民意基础,“因之影响颇大”^④。而且,此战役失败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声誉亦受到重大的冲击,蒋介石曾自述“中外舆论对我讥刺诬蔑”^⑤,不仅“民众不信任我们,外人亦看不起我们”^⑥。

对于中国国共两党而言,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就使国民政府丧失了从郑州到桂林的大片国土,而中国共产党军队却“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和“一天一天的发展”,其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⑦。在国民党军的大溃败与中共对日作战的辉煌战绩对比下,国共两党的地位和声誉发生了根本转变。基于此,周恩来提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的论断,主张“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⑧,并且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立即召集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刷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⑨。为了应对不利的局势、抵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方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决议“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而视中国共产党为“有敌性之党”^⑩,并有意拉拢青年党以分化民盟、制衡中国共产党,进而使青年党“脱离民盟”而“彻底与国民党合作,对抗民盟与中共”,从而“基本奠定了1946年之后国民党、青年党一起对抗中共与民盟的政治格局”^⑪。从历史进程来看,豫湘桂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45年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评此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4年9月24日,第1版。

②《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2月9日。

③黄天华《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49—156页。

④《吾人对于当前时局应有的认识与奋斗(1944年10月27日)》,第103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献/石叻丛书一言论第十九集,典藏号008-010102-00019-023。

⑤《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11月21日。

⑥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489页。

⑦《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再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0—631页。

⑧周恩来《如何解决——周恩来双十节讲演(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页。

⑨《致史迪威将军说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⑩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471页。

⑪黄天华《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62、163页。